

文化的反思与重建

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

主编·李小娟

主审·丁立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久军

封面设计:百源企划

文化的反思与重建

——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

李小娟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字数:400 000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207-04830-0/B·148

定价:38.00元

文化哲学的建构

- 文化哲学的主题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衣俊卿)
- 文化哲学何以存在(丁立群)
- 20 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洪晓楠)
- 文化哲学的当代追求(邹广文)
- 文化批判及其维度(王国有)

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

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收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这里既包括以狄尔泰、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传统的文化学研究,也包括由泰勒、马林诺夫斯基、杜尔凯姆、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所代表的实证传统的文化学研究。当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内蕴或制约因素为人们所关注时,文化学研究开始同哲学研究交汇,形成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

文化问题的突出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入与人类所经历的重大的文明转型和文化危机直接相关。到 19 世纪中叶,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也就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在一个充满创造性同时也充满竞争的开放的世界中所展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同传统社会中由传统文化因素制约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尖锐的对立冲突,清楚地展示出从远古时代开始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巨大惰性,使文化的转型成为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进入 20 世纪,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

中,人类在获取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开始体验受自己的造物的统治的异化状态,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文化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为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表现形态。

上述历史现象有很大的普遍性。本世纪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提出和各种见解的冲突,总是集中于文化层面,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始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继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热”之后,在 80、90 年代,文化哲学又成为学术界重新关注的热点领域。然而,在经过长时间的文化哲学学说的引进和文化哲学的探讨之后,人们发现,对文化现象的不同理解和对文化体系的不同建构使得文化哲学的划界问题成为制约着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性问题。于是,文化哲学的研究又要进行一些初始性的工作。

一、文化的本质

人总是文化的人。换言之,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人们不仅在历史的平常时刻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文化中,而且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代,还可以体会到文化的断裂,即一种旧文化的衰亡和一种新文化的诞生。应当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

然而,虽然文化无所不在,但文化似乎是无形的、深层次的,因此是很难把握的对象。文化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文化。应当说,今天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据许多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考证,“文化”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 18 世纪在法语

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 18 世纪末,特别是在 19 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进展,文化范畴的内涵越来越深化和丰富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文化的规定性。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罗列各种文化学和人类学文献中出现的所有文化定义,而只能通过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的揭示而逐步接近或逼近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首先,文化具有人为的性质,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文化往往同自然和人的先天遗传因素相对,它是人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活动的历史积淀,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和历史是同义的范畴,它们代表着对自然的超越。人饿了就要进食,这是先天决定的生理现象,不属于文化,但吃什么和以什么方式进食则是一种文化;人性饥渴时就要同异性进行性交,这属于生理本能,而不是文化,但与什么样的对象,在什么场合性交,则是文化,等等,如此的例子很多。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起源入手,对文化的非先天遗传性和超自然性可以有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通过“未特定化”或“非专门化”范畴来确定人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先验的结构整体”,并由此为文化的起源确定了基础。他认为,从人的生物学领域来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动物在体质上的特定化使它们可以凭借某种特定的自然本能在特定的自然链条上成功地生存,而人在体质和器官上则呈一出非特定化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在自然本能上的薄弱。换言之,人无法像动物那样,完全凭借着本能生存。然而,正是由于人先天自然本

能方面的缺憾使他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突现出来,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这种补偿人的生物之不足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文化。因此,文化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格伦由此把文化称之为人的第二天性。

其次,文化具有群体性,它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因此,文化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先在的给定性或强制性。个人的偶尔的行为,或者只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所运用而不为群体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构不成文化模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文化从起源上讲具有人为的性质,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以自觉的方式行使功能。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具有处在性,是历史地凝结而成的非个体性的习惯。

美国学者 C. 恩伯和 M. 恩伯对文化的群体性、强制性和自在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指出,“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想某个问题或做某件事,那么这个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观念和行为。”^① 正因为文化是群体的和共同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之中的文化时,他的生存就将陷于困难。“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②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初步限定,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

① C. 恩伯和 M. 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30 页。

② C. 恩伯和 M. 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 页。

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然而,按照这样粗糙的界定,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显然,上述关于文化的阐述还基本上是对文化的文义的界定和外延的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与文明是同一范畴,或者是同义语,他们是与自然相对照的大范畴,可以涵盖人之一切造物,因而,文化和文明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然而,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界定再深入一些,再精确一点,从其本质特征入手,就会发现,文化和文明范畴又有一定的差异。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升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

二、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

通过上述关于文化的本质的界定不难看出,对于人的生活和人的世界而言,文化的确是最深层的东西,它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就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层的变

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而现代文化哲学正代表着对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其变迁的自觉的理性反思。

现代文化哲学吸收了一般文化学和人类学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但又没有停留于对文化现象的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而是把关于人的文化的实证研究同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关于人和文化的总体性理论。现代文化哲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哲学学科或研究领域,而是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一般说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韦伯和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逼近和揭示了文化哲学的主题。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建构起文化哲学的整个理论框架,而首先想揭示一下体现在上述不同哲学领域或流派之中的现代文化哲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即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

1. 文化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模式是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往往以外显的、自觉的方式为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和框架。而文化模式则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虽然文化的影响力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直接和强烈,但更为持久和稳定,它往往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左右人的行为,

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和历史的进程。因而,文化模式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

在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本尼迪克特的见解最为著名。她由于文化模式的探讨而使自己的研究层面从一般的文化学和人类学进入到文化哲学的高度。本尼迪克特指出,以往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都过多地分析具体的文化特质,而忽略了文化的整体,即文化模式。她认为,由各种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模式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将每一个体的行为包容于文化整体之中,赋予它们以意义。她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动作,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① 依据上述理解,本尼迪克特专门致力于探讨民族的文化模式。例如,她借助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概念,在《文化模式》中,分别以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和平原印第安人为典型,揭示了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前者以安稳、秩序、节制、中庸为根本特征,后者以幻想、竞争、狂乱、过度、激情为根本特征。本尼迪克特还在《菊花与刀》中把日本民族的矛盾的民族性格界定为一种耻感型文化模式,它不同于欧美各民族起源于希伯来精神的罪感型文化模式。

应当说,文化模式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我们不仅可以在共时的、民族的、地域的意义上,也可以在历时的、进化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无论揭示哪一个维度上的文化模式,对于认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识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人的行为,认识民族的差异、历史的演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共时的维度上,我们仅可以像本尼迪克特那样比较分析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罪感型文化模式和耻感型文化模式,而且可以在更大的尺度上讨论类似东西方文化模式的差异问题。例如,中国先秦哲学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与古希腊哲学所包含的以人和自然的分化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对于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历史的分道扬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同尔后中国科技理性和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以及历史进程缓慢之间的关联,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同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达之间的关联,都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历时的维度上,我们可以通过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换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视人类历史的演进。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段划分,我们不仅可以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对立的状况等为参考系,而且可以以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换为深层坐标。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人类迄今经历了三个大的文明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舍去一些具体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我们可以断言,在原始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神话、图腾、巫术等构成,物我不分的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在农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科学、知识、信息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显然,对文化模式的这种历时性探讨,可以演化化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

2. 文化危机 文化危机是现代文化哲学的另一重要主题。虽然文化模式同经济和政治体制相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它并不

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文化模式也会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政治经济变化相比,往往更为深刻。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习惯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而一个地域、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根本变迁则常常要经历过某种文化危机的过程。一般说来,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效,即支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普遍的文化习惯开始失范,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根据。文化危机可以表现为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人的精神上的“不在家”、意识形态的“断裂”等等。文化危机时期往往是文化批判的时代。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危机在中外的历史上都发生过。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分析过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所经历的以“逃避自由”为特征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他认为,中世纪虽然缺乏自由,但人却凭借着同周围世界的天然联系和自在的文化模式而获得生存的自在的意义和安全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闭的传统世界,一种理性的自由的文化模式开始生成,这种变化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危机,因为,人“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①“逃避自由”的现象正是这一文化危机的极端表现。

相比之下,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文化危机更为深刻。文艺复兴之后,以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背景,理性文化模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

^① 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许多人依旧深信理性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其自身的自然性,正在而且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造物的属人的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到无形的异己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空虚、孤独、畏惧、烦恼、异化、无意义等开始笼罩着人们的文化心态。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应当说,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期,以“天人合一”为本质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超稳定性,但是,即使是这一文化模式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着深刻的冲突和危机。无论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在 80~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中国民众都经历过文化心态的困惑和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危机,即以“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伦理本位主义为特征的自在自发的传统中国文化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无法成为现代人的活动的依据和意义的源泉。

3. 文化转型 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即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文化转型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即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往往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意味着人的安身立命的支柱

的更换,意味着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改变。但是,尽管如此,文化转型却往往不像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那样,它往往不是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常常表现为自发的进程。本尼迪克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文化转型的这种自发性质。她指出,“当我人回顾一代人以前的文化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改观的程度,有时甚至意识到我们最熟悉的行为的改观。至今为止,这些改观的发生都是盲目的,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回顾才能确定这些改观所产生的后果。”^①

然而,西方社会在本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和不发达社会在汇入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深刻的文化冲突,把文化从政治经济体制的背后拉到了历史进程的表层,从而使得文化转型不再简单地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加以自觉的引导。这正是自觉的文化哲学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同时,文化转型也同文化模式和文化危机一样,成为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之一。众多的现代哲学流派都致力于通过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来推动自觉的文化转型。例如,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批判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实证主义的理性文化模式和人本主义文化模式的转型;中国五四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 80 年代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推支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传统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现代理性文化模式的转型。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 页。

三、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主题的定位

中国学术界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兴起了一次较大的“文化热”，主要是围绕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优劣命运等问题展开。而自觉的文化哲学探讨则于 80、90 年代展开。在实践哲学、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等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层面。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哲学同 20 世纪范围内的文化哲学思潮一样，都兴起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尺度的、各种价值取向的文化危机、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因此，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也同样是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主题。但是，我们同时还应看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还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在对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的一般研究层面上，它的研究主题还应有自己特殊的定位。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是在相互冲突的双重背景中展开的。一方面，它面对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如前所述，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的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精神，以及重复性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塑了中国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当市场经济建构走向深化，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相冲突。这种文化冲突表达出现代化的深层次要求，即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方式向自由的理性化活动方式的文化转型，这也就是要求人成为自觉的和成熟的现代化主体。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又同时面对着发达工业社会

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时,而是在西方式业文明已经十分发达以至于开始展示出自身的弊端之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展示了人的创造力和本质力量。到了 20 世纪,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虽然依旧通过社会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展示自己的力量,但它同时也陷入了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破坏等,开始展示出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于是,便有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由经验型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转型之时,又目睹着理性文化模式的局限和弊端。

上述双生背景所导致的价值冲突和错位使得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任务十分沉重与复杂。我们只能在这双重文化背景的冲突和交叉点上来确定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哲学一方面应当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换言之,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研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它寄希望于中国民众在文化转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即成为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现代主体,但又不要由于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发达而使自己陷入新的异化和物化之中。

应当说,从理论的全面性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一定要兼顾上述双重任务。但是,从历史进程的紧迫性来说,我们则应把文化哲学的研究主题重点定位于文化转型的自觉推进。这是因为,在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层面

上,中国尚未完全超越农业文明形态,还只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时期,因此,以理性文化模式取代经验型文化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的使命。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同其他一些民族相比,中国具有过分庞大的日常生活领域和过分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这使得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十分困难。对此,我们可以略加展开。第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本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关系、人情关系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生存。第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是天然家庭和血缘关系的放大,相应地,有组织的活动领域的运行也带有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重复性的和自有的特征。第三,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上,其主要导向不是超越自然关系,把人从自在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而恰恰是对自然的回归与肯定。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基于自然血缘关系之上的伦常的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的赞美,大大地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等本质特征。第四,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不但自身十分强大与沉重,而且具有吞食自觉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领域的倾向。这一倾向至今仍十分严重,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盛行着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方式,连哲学和艺术这种需要自觉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也成为按固定模式和框架进行归类与复制的日常重复性活动,如此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人们至今还在以自在的和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从事现代社会的创造性的非日常的社会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